

## 馴服偶然與數目字治理

◎ 劉 鋼

哈金 (Ian Hacking) 著，劉鋼譯：《馴服偶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加拿大著名學者哈金 (Ian Hacking) 在當今英語世界中頗具盛名。他的《馴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 一書於1999年被「當代文庫」(Modern Library) 叢書編委會評選為「本世紀英語世界最優秀的一百部非小說類作品」之一，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很大。該書初版於1990年，1991年和1992年有過重印。中央編譯出版社的「新世紀學術譯叢」於2000年出版了該書的漢譯本。哈金生於1936年，1956年畢業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數學與物理學系；1958年又獲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道德科學系學士學位；1962年獲劍橋大學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自1982年起任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哲學系和科學史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所教授。哈金長期從事統計思想史的研究，《馴服偶然》是他花費十年心血寫成的力作。

我國學術界對黃仁宇先生的作品和思想比較熟悉。十多年前，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組織翻譯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在翻檢文獻時，見到他對黃先生關於「明代的漕運」這個專題的評價，李約瑟說黃先生的研究是一切圍著數目字轉。而哈金的《馴服偶然》便是一部關於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利用數目字治理國家的書。黃先生曾頗有感慨地談到中國傳統的治國方式是「間架性的設計」，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鳥瞰的態度裁奪」。他認為這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正如李約瑟評價朱子時所說，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式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式的宇宙觀。這種理念應用於社會政治方面，則出現這樣的情況，「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結果則是中國的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在黃先生看來，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名與實之間沒有成功地得到鏈接，也就是說，中國不能用數目字治理國家。

於是，數目字治理便成為我們必須要補上的一課。實際上，「數目字治理」就是「現代化」的一種隱喻。我們對於「現代化」的理解似乎總是一種時間的觀念。不論在英語還是漢語世界，均是如此。如中國學者何傳啟便提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分為四個時代、十六個階段。然而，仔細探究一下，事情好像又不盡然。「現代化」一詞的英語是modernization。這個詞的詞根是拉丁語的modo，即「模態」的意思，所謂「模態」就是要求人們這樣做，不要那樣做等等。轉義為「模型」、「型範」、「模子」的涵義，它規範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所以說「現代化」更像是一個「模型化」的過程，因而更傾向於一個空間的觀念。那麼現代化的模型是個甚麼樣子的呢？我們說西方現代化基本上是按適應工業化大生產的「模型」安排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請君入甕」，「甕」就是個有形的「模子」，而「現代化」這個

「模子」卻是無形的，但是每個人卻都要服從其「邊界條件」。

確定現代化的「邊界條件」是件很複雜的事情和漫長的過程，其中涉及到管理者對國家的各種構想。但是這些構想如果不付諸實施，就只能是空想。西方的現代化始於何年何月已不可考。從「現代」（modern）一詞問世的1585年算起，大致不會出大的問題。這個年代基本也就是始於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年代。後來經過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等階段來到後現代。「後現代」一詞始見於1949年，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經過了三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已經結束了。西方社會目前處於一種「後現代狀況」。那麼在過去的三百多年間，這個使西方人「就範」的「模子」究竟是甚麼？其奧秘何在？這個話題便是哈金在《馴服偶然》一書中所要講的故事。

## 二

哈金本人將他的思想方法歸結為統計性的，因而他的世界圖景是統計學意義下的，即非決定論意義的。哈金認為，他所持的這種思想方法或推理風格是晚近才有的，確切地說，「僅僅是1660年前後才問世的，而且直到十九世紀之前，統計的思想並沒有大的躍進」。那麼，十九世紀後西方社會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在哈金看來，西方社會發生了一場「概率性革命」（probabilistic revolution）。凡是標以「革命」的事件，總是伴有劇烈的活動，而這場概率性革命的顯著特徵便是西方社會出現了印刷數目字的「雪崩」，最終導致數千年決定論的觀念遭受「侵蝕」。決定論遭受侵蝕的結果便是社會逐漸「成為統計學意義下的了。一批類似自然定律但只與人有關的新形式的定律問世了」。

人們不禁要問，這類與人有關的新定律意義何在？新的定律「對人和世界的支配不是更少了，而是控制更強了……這便是偶然被馴服的原因所在」。這些根據概率論表述的新定律的內涵為「正常」和「偏離正常」的狀態，即我們熟知的那條高斯曲線。這便是令西方人就範的那個無形的模子。人既然可以根據這兩種狀態來表示，那麼人性這個說不清楚的概念，便逐漸被「正常人」的概念取而代之，大家不再討論啟蒙時代所遺留下的人性的問題了。這類有關社會和人的定律涉及偶然。偶然雖然在本質上是統計學意義的，卻是不容改變的，甚至是自調節的。同這些定律的集中趨勢保持一致者就是正常人，而處於兩端者（離中趨勢）則是病理學意義的人。多數人都試圖使自己成為正常人，這反過來又影響到何為正常的問題。這類偏好在原子那裡找不到，人文科學所顯示的是物理學中尚未發現的互動效應。

吃喝拉撒睡，喜怒哀樂哭是人的自然屬性。可人是不允許像獸那樣活著的，人還有他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曾說，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總和。那麼，作為社會關係總和的人的屬性又是通過甚麼體現出來的呢？在哈金看來，是通過統計數字。統計使一個嶄新的人問世了，其本質是由一千個數字編織而成的：

為了獲得一種精確的表現，統計研究伴隨著一個人的一生。它負責這個人的出生、洗禮、接種、中小學教育以及由此而來的成功、他的勤逸、離校，以及隨後而來的高等教育和發展；而且一旦他長大成人之後，還負責他的體格以及從戎的能力。統計學伴隨他以後的人生道路，它記錄了這個人所選擇的職業，在甚麼地方成家以及治家等；如果他從年輕時便為老年儲存了豐富的資源；他何時、在多大年齡結婚以及他娶了甚麼人為妻——不論事情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還是向不好一邊滑落，統計學都將照料著他。如果他經歷過沉船、遭受過物質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毀滅，統計學也照樣記錄。統計學只有當這個人死去之後才離開他——在他死後還要確認他去世的準確年齡並記錄下他的死因。

這便是西方「卷宗社會」(dossier society)的基礎。在這樣的社會裡，利用人們日常生活所留下的各種數據，便可以掌握人的生活方式、習慣、下落、社會關係等等。因而，每個國家也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統計學上表現出來。這類關於人的系統數據採集不僅影響到對一個社會的構想方式，也極其深遠地改變了我們的選擇，從擇業行為到思維方式。

### 三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不在於解釋世界，而在於改變世界。西方對社會的改變源於一種理念，即通過點查和分類可以改善（控制）有異常行為的亞人口群體。然而，並非任何數目字都能起這個作用。許多定律般的規律都與異常現象相關：自殺、犯罪、遊民、癲狂、賣淫、疾病等。由於十九世紀末雪崩般的統計數字，人的多種行為，尤其是異常行為，被列入官方的統計研究的範疇。通過研究發現，這些現象年復一年似乎具有驚人的規律。有關社會的統計定律便是從這種關於人的異常行為的研究中發現的。其目的又是甚麼呢？根據平均值和離中趨勢的數據所形成的正常人的思想，開始實施若干社會工程，以便「改造不合需求的社會階層」。正如優生學的創始人高爾頓(Francis Galton)於一百年前所說，概率定律的首要目的便是「在最具野性的混亂之中以寧靜和完全平淡的方式實施帝王式的統治」。

道理似乎人人都懂，關鍵還要看故事是否精彩。哈金講故事的方法也不同於以往的我們熟悉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舊套路。他用的是法國當代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的講法，以歷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闡述其哲學思想。走進作者的世界，就好比進入一座博物館，每一章便是由各種數目字事實布置起來的展廳。沿著博物館的長廊走下去，兩廂的展廳向我們展示了西方社會發生的那場持久的、全方位的概率性革命，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西方社會何以呈現出今天這幅圖景的原因。

然而，「偶然」真被「馴服」了嗎？果真如此，自由意志又當何如？這個問題哈金的回答非常巧妙。所謂「馴服」是統計學意義下的，作為個體，正如他所引用的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的詩：「孤注一擲絕不會破壞偶然性」。不論當骰子是在永恆的環境下擲出的——這可以使我們靜觀宇宙的星群；或者是在完全個人偏好的環境下擲出的——這可以將我們個人的命運封緊，「偶然均湧入我們感官的每一條通道。」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3年2月號總第七十五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